

“影响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之六 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区域经济协调联动步伐提速，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全面实施，与既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加之迅速发展的高铁网络使得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系列区域发展的新成就，与区域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或者说，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在理论上有力地支撑了区域发展实践。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中国已经成长起来一大批致力区域经济研究的学术群体，包括从事经济地理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是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的经济学家，准确地说，他们是区域经济学家。

我国的区域经济学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步，90 年代后迎来区域经济学的春天，研究机构 and 人才队伍如雨后春笋，每年出版的学术论著非常可观。这些学术成果紧密联系区域发展实际，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革新研究方法，主题内容非常契合我国区域发展形势，并出现社会科学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跨学科融合交流探索的全新趋势。应该说，人才和学科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中异军突起，学术研究已经可以支撑区域发展的科学决策，人才队伍与智库建设可以从容服务区域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但实际上，我国有几位老一辈经济学家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曾涉猎区域经济的研究探索：方显廷（1903—1958）对西南工业区位地位

的认识以及对战后工业区位的关注，陈振汉（1912—2008）的《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陈翰笙（1897—2004）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尽管那时没有“区域经济学”概念，他们囿于西方留学的实际，研究的区域问题也主要涉及国外的区域经济问题。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认为，冀朝鼎（1903—1963）可能是研究区域经济最早的经济学家。冀朝鼎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于 1936 年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该书的中译本于 1981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是区域经济研究的滥觞，它开创了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先河。这部著作在西方经济界深孚盛名，一直被西方学者当作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读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我国区域经济史学研究的基础，冀朝鼎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区域经济研究先驱。

鲍觉民（1909—1994）和孙敬之（1909—1983）都是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他们长期从事经济地理的研究与教学，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区域经济人才。

对我国区域发展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杜润生（1913—2015）。农村是中国最大的区域，没有农村经济的变革就没有今天的区域发展成就。杜润生在改革初参与领导农村改革实践中，就提出“创造适合不同地区生产水平的经济形式”。这可以视为杜润生区域经济思想的发端。他虽然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但他

在考察全国不同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工作中，也会使他不断地思考区域经济问题，比如西部经济问题、城市经济问题、山区发展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杜润生虽然没有系统探讨区域经济理论，却在积极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他的农村经济思想都是在有关区域的农村实践中认识并形成的，其中包含了许多区域经济思想，这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

刘再兴（1926—1999）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直致力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是最早招收区域经济（经济地理）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之一，在我国区域经济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林凌（1926—）是我国区域经济的最早研究者之一，是我国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他以研究我国东西部经济关系主线，着眼于我国区域战略布局的全局。在发表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成因及改革对策》之后，接着发表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起飞的道路》专著，对中央提出西部大开放战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提出的城市经济中心论、城市化商品化和城市开放、双轨推进的中国城市化道路等理论观点，直接指导了城市改革的实践。林凌在区域经济研究与实践推动方面结合得比较密切，其影响是全国性的。

胡序威（1928—）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规划，著作有《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等。胡序威从事区域经济地理、区域规划和城

市发展研究数十年，主持完成的主要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奖励，在区域经济界有相当高的学术威望。

陈栋生（1935—2016）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他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就从事生产力布局 and 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现实经济问题有实感，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建立密切关系，对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和发展做出过开拓性贡献，取得了全国学界公认的成就。1985 年，他率先提出了东中西“三个地带”划分的理论和发展思路，完成了《“七五”和后十年（1990—2000 年）中国生产力布局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写进“七五”计划纲要。上世纪 80 年代，他对工业布局 and 环境保护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多部专著，这些理论成果对区域战略、区域规划、区域政策的制订起到了指导作用。他较早对中部崛起、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做过专门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预见性、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陈栋生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发起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学，他独领风骚，影响空前。

陆大道（1940—）是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问题研究。他组织了对我国工业布局 and 工业地理学的学术总结，初步建立了我国工业地理学的理论体系。陆大道上世纪 80 年代首次提出关于长江流域“T”字形的发展战略，即由沿海为一

个战略轴线，沿江为主轴线形成的整体空间格局。他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被写入《全国国土整体规划纲要（草案）》，并被国家“八五”和“九五”计划所采纳，不仅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布局，更是获得学术界广泛引用和推崇。陆大道对我国区域发展、地区差距和大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的大量实证性和理论研究，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影响是非凡的。

周一星（1941—）是最早从事中国城镇化和城市体系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推动城市地理学发展和我国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影响广泛。周一星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城镇化、城市体系、城市体系规划、城市发展和城乡规划、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等，发表论著 200 余篇（部），多次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奖等。

李善同（1944—）主要从事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与预测，区域经济和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发表过不少区域经方文章与论著。

金碚（1950—）的学术影响主要是工业经济领域，他是竞争力经济学 and 报业经济学的开创者，在工业经济学方面贡献颇多。同时，金碚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站位高，视野宽，又受陈栋生的学术影响，他在区域经方方面的研究也取得很高成就，亮点不断。近年来，金碚担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长，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和区域实践做了大量工作，影响与日俱增。

（待续）

影响经济思想中动态观念变化的四种力量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吴振宇

经济现实的变化

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是理论变化的根本原因。现实对理论的影响，既可能以相对缓和的方式进行，也可能会以被命名为“革命”的方式进行。后一种方式的发生，一般是以经济或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从而点燃新思想的火种。

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推动学者在描述经济体系时，对原有理论做出调整或创造自己的理论。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与马歇尔写作《经济学原理》时的经济不同，更与上世纪 20—30 年代垄断资本盛行时的经济不同。在生产手工制时期，工人在生产体系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劳动力在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亚当·斯密时期的市场经济与现代信息革命下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差别就更大了。随着经济体系不断变化，亚当·斯密的“自利导致利他”的逻辑链条，不断地被经济学家重新论证和修订。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是永恒的课题，经济学也需要跟上这种变化，调整分析工具与核心议题。

经济思想进步的另一种方式是以经济危机为契机，触动学术界对旧传统进行批判和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说“一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方法的变化，通常并非是我们科学的自身的发展，而是由社会变化的外部势力所造成的”。缪尔达尔指出的情况，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泛而持久的失业和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促进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重商主义时期，生产主要依附于农业的产出，贸易在财富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直观地看，一方贸易所得自然是另一方所失。所以，重商主义时期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是静态的。古典主义的早期，工业快速发展，人类利用理性力量征服自然的信心高涨，亚当·斯密主张的交易—分工循环模式，指明了乐观的发展前景。古典主义的后期，生产过剩型危机频繁发生，经济理论蒙上了灰色的基调。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带来的思想影响，向整个经济领域蔓延，利润率下降成为一个重要的威胁。这种悲观思想直到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时期都有显现。然而，现代技术进步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经济学家对未来乐观的成份不断增加。经济思想史学家斯皮格伯格指出“一个作家或学派是如何应对稀缺这一根本经济问题呢？……中世纪学者专注于消费者保护……而重商主义者试图经由让别国付出代价的方式追求国家财富来解决问题；斯密主张自助；马尔萨斯主张自制。”不同时代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反映着那个时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对经济前景的看法。

早在配第时期，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劳动和地租在分配中的对立关系。这种生产要素间的对立关系本质上看是一种静态观念的体现。在土地、劳动的互动关系中，在剩余分配中只有份额的此消彼长，没有相互激发而产生的新利益。然而，资本、劳动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同的。一份资本与一份劳动结合，资本可以通过增殖持续扩大自身的数量；劳动生产率通过资本深化也可不断提高。劳动与土地、劳动与资本，两



种对立关系关键性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以自我增殖，而土地不能扩大。驾驭资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空间广阔，而驾驭土地的劳动生产效基本没有什么提升空间。在劳动和资本两者的互动关系中，现在与未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现实中两者的对立。正是经济运行本质规律的这种变化，推动了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转换。生产与分配从静态的要素间的对立关系，转向面向未来的动态关系。在相互协作过程中，谁对于新增价值贡献大，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份额。这既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更有利于高效率资源的再生产和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是工业化发展对经济分析的提出的新要求。

当然，经济思想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经济科学也有其自身成熟发展的路径，比如边际革命的出现就会必然导致供需均衡原理的发展；理性预期的发现就会推动宏观经济分析采用一般均衡的框架。

分析工具的变化

经济思想的转折性变化是从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并带动剩余分析方法向边际分析方法转变。分析工具的变化与分析内容的变化往往纠缠在一起。首先，对经济现象关注点不同，会促使经济学家去寻找新的分析工具，而新的工具又会影响到下一批经济学家关注的领域。“希克斯和罗宾逊等经济学家就坚持认为……原因与其说是分析工具箱发生了转变，不如说恰恰是经济的概念发生了转变，也就是从古典（价格）方法到边际主义观点的转变”。所以，工具转变既是经济学重心转移的原因，也是重心转移的重要体现。

古典的剩余方法向边际主义的均衡方法转变是一个关键性节点。此节点之后，是沿着马歇尔的路径还是瓦尔拉斯的路径，抑或是门格爾的路径，又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但无论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边际革命后，“均衡”所概括出的内在驱动力成为经济分析的重点环节。这与古典时期的“剩余”和“积累”所暗含的目标导向形成明显对比。“均衡”，暗示着一种市场主体控制不了的力量，企业只能成为价格接受者，也就是均衡状态的接受者。但“剩余”和“积累”暗示着经济主体的主动追求。企业需要在经营中获得剩余，并且通过积累扩大剩余。主题的转换使经济分析的动态因素被大

幅削减。

均衡与动态的矛盾在边际革命发起之时就存在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看到将均衡概念与经济动态结合起来时的困难和妥协。斯拉法很早就发表了对马歇尔厂商或产业理论的重要批判，直接威胁到供需均衡理论的基础。门格尔创立的奥地利学派，不满均衡分析的静态特质，以过程分析作为其在边际主义框架下的核心理论。创立一百多年来，虽然奥地利学派一直是非主流经济学，但是它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凯恩斯的理论是边际主义学者中将动态因素与边际分析结合最贴切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尝试算不上很完美。因为其框架总体是一个短期框架，投资只体现为需求，而没有表现出其生产的一面。但是，凯恩斯坚持了投资与消费的主动性，坚持了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流动性需求。可以说，他抓住了动态的根本要素。而且，凯恩斯的理论可以模型化，这是许多坚持动态观念的经济思想难以做到的。

新古典综合在技术层面上对凯恩斯的动态观念有所发展，比如将乘数与加速原理结合起来。但是，新古典综合在试图为凯恩斯宏观理论寻找微观基础时，在思想上侵蚀了《通论》的革命性和动态性。从总体上看，凯恩斯描述的更像是一个非均衡的发展经济。这一点，也是罗宾逊夫人等后凯恩斯主义者所坚持的。但是，新古典综合更倾向于用向均衡运动去解释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思想中最具有动态化的因素，在新古典综合之后并没有得到认可和进一步的发展。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均衡分析的概念和技术进一步发展。上述三个学派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不够有力，而对于经济发展说的更少。新凯恩斯主义在思想上是升级版的新古典综合。它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通过设定摩擦和粘性分析经济的波动过程。

哲学观念的影响

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在本质上受到了“内在秩序”观念的影响。重农主义的内在秩序体现为“自然秩序”，亚当·斯密的内在秩序是“自然法”。这种观念持续地影响着新古典主义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自然秩序”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是以“看不见的手”的形态存在的；到了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就以边际替代率递减显现出来的；到了阿罗—德布鲁那里，则以

“不动点定理”，以及后来的“利亚波罗夫方程”的形式存在。分析技术在不停的变化，但其基本信念没有变。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运用各种高深的数学工具，努力地将预设的保证经济均衡的稳定机制显现出来。

边际革命之后，均衡理论在经济学科领域获得支配地位。这种理论明显是以一种类似于机械学的形式出现的。凡勃伦认为这种理论“是一种目的论的、非历史的、忽视经济过程的不可逆转的理论”。比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中使用的最大化原理，就是典型的表现。“正像一个物理学家，如果他能用最大化原理把观察到的规律公式化，就总能获得更大、更经济的对自然的描述一样，经济学家也能运用这个方法，获得更好、更经济的对经济行为的描述。”经济具有内在秩序的观念、物理学的隐喻等哲学思想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观察经济动态问题的视角。

意识形态的影响

由于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对现代经济体系的要求，就与自给自足时代不同。是按照更加普适和人道的原则去建设一种社会关系，还是按照商业和生产的原则去改造社会关系，还是按照商业和生产的原样去改造社会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选择。在这样一个“无人区”，没有什么必然的原则需要去遵从。人类拥有了自由的选择权。“上帝给人一张口，也给人一双手”，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但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可能这双手无法再去保障自己的“口”。与此同时，其他人的“口”可能消耗了过多的食物。正是因为现代经济生产是人类面临的新事物，意识形态在经济学科中的多样性才更加明显。

意识形态的取向，影响到经济学家分析工具的选择、关注的议题和最终结论的形成。萨缪尔森建立新古典综合体系时，美国正值麦肯锡主义盛行，凯恩斯主义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在矛盾的革命性成份被大幅削减。意识形态取向在多数情况下是隐蔽的。许多经济学的先验性假设，暗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比如，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可以使经济模型走向均衡和收敛。同时，规模报酬递减假设暗藏结论是，随着资本积累进程推进，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中，资本将处于弱势的地位。显然，这种假设是有利于资本家的。在经济思想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真诚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希克斯等人；也有许多不那么真诚的经济学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经济学家正在极力地向你灌输些什么，而不是通过逻辑展示让你信服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化随着经济组织形式变化也会动态调整。比如，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就是动态变化的。如果劳动者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工资收入中只要极小部分就可以维系生活，这样的阶级关系与维生工资时代就会不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波普尔是西方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其门生索罗斯更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开放的未来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如果未来是可以预测的，那么政府就可以社会工程

的名义干涉个人的自由。所以，他们坚持的自由主义是否定未来可以预测这一原则的。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写道：“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并且自信地宣布：“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索罗斯在其《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以响应速度最快、信息完善程度最高的金融市场为例，说到“在现实世界中，均衡概念所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很少满足。金融市场试图把未来‘贴现’，而未来又反过来依赖于现在它如何被实现”，由于参与者的理解不赖于结果是否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不可预测性，是西方自由主义标志性知识分子和金融实务界所主张的哲学理念。但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中，未来变得越来越可预测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在哲学与经济学理论层面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以否认经济体系存在协调不当和拒绝政府干预为主要取向。经济学界采取的思路则是，逐步增加经济主体的理性成份。先是从货币主义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开始，而后是理性预期设定的预期是现实的无偏估计。在这场革命的冲击下，经济学最终走向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在完成方法论转换的同时，也就完全否认了经济运行中的内在协调问题，从而完全否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在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体系中，分散的经济主体，通过竞争作用，最终达到协调一致。瓦尔拉斯框架下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就是探索竞争条件下，均衡解的存在性、稳定性。理性预期的假设，使经济体系形成均衡的机制前移，经济主体只需要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处理就可以形成对未来无偏差的估计。虽然不是完美预期，也就是说不能保证与真实世界绝对一致，但它是围绕真实性的无偏估计。如果存在许多经济主体，那么它们各自的预期将形成一个集合。这些集合就会体现出真实世界应该体现的局面。换句话说，每个经济主体不再需要与其他经济主体间进行竞争和互动，市场机制没有机会去显现它们的作用。

承认理性预期并不否认市场和竞争的作用，也许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都体现在历史的信息之中。但是在当下的制度体系中，确实看不到市场对于决策失误的校正机制。这是理性预期难以自圆其说的一面。虽然都是反对政府干预，波普尔的思路在于政府和个人对于未来都是无知的，不能赋予政府以未来的名义侵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经济学，则认为经济主体对于未来以及政府行为的估计是无系统性偏差的，政府既不应该也无法干预经济运行。矛盾在于，未来的开放性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因为未来是开放的，人们才有自由去寻求开放的结局。但是，理性预期却是排斥未来开放性的。自由主义的内部逻辑实际上处于矛盾状态，但是他们在政策主张上却又是一样的。这使人不由提心，在倡导科学性的经济学背后，意识形态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